



忆蒋南翔同志 在清华园的几件事

■ 吴承明

我是在清华园认识蒋南翔同志的，认识的渠道是现代座谈会和《清华周刊》。

清华的现代座谈会成立于1934年春夏之交，这年秋我考进清华大学，就参加了该会的活动。南翔同志是该会哲学组的负责人，但经常主持一周一次的时事座谈会，会上有不少理论性的讲话。我原是化学系学生，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，多一半是受座谈会的启发。这年10月，南翔同志邀请冯友兰教授到现代座谈会演讲《访问苏联之印象》，海报一出，听众踊跃，开成一次大会。南翔同志主持大会，并做介绍。会后不久，冯友兰先生即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，解往蒋介石在保定的“行营”。原来冯先生是出席在欧洲召开的国际哲学年会，提出论人生哲学的论著，归国途中应苏联哲学界的邀请访苏的。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这样一位中外闻名的学者，实在荒唐。一时舆论哗然，冯先生旋获释。

南翔同志比我高两个年级，但还不是毕业班，不算是“老大哥”。他给我的印象却像是一位长者。他待人和蔼、亲切、言谈稳重，好像还有点腼腆。一件灰布袍，平时静若处女，闲时一把二胡，闭目独奏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青年蒋南翔可说是思考型的，他九分沉思，一分表态，所以言语不多，言必有中。

南翔同志是中国文学系的，他与外国语文学系的何凤元、学哲学的张宗植都是宜兴人。三人原称莫逆，又都才华横溢，都是《清华周刊》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，堪称清华园三才子。

当时左派同学没有能参加学生自治会的领导班子，却从1934年起掌握了《清华周刊》编辑部，由当时的中共支部书记牛佩琼任总编辑，把它办成了一个进步文化的论坛。这年秋，牛佩琼受国民党特务跟踪，不得不离校；南翔膺选为周刊总编辑，姚依林为单独出版的副刊编辑。这一届的《清华周刊》社，人才济济，佳作如流，还出版了几期扩大篇幅的学科专号，声誉日隆。我就从中学了不少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。《清华周刊》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发行网，有一百多个户头，遍及各省市以至海外。时我任总发行，一些当时不能公开投邮的抗日救亡文件也是用《清华周刊》的封套，经这个发行网发出。

1935年1月和3月，国民党反动派两次在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近三十人，包括何凤元和张宗植，都被捕了；清华的党组织遭到破坏。这时，就剩下蒋南翔同志来领导反白色恐怖的斗争了。他一方面奔走各方营救被捕者，一方面谋求恢复组织。恢复之道有二，一是他与陈国良（陈落）、牛荫冠重建“社联”的清华小组，吸收了一批积

极分子。一是建立“民族武装自卫会”的清华小组，其中大部分是低班同学；当时姚依林和我已通过世界语、新文字活动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。但是，这时的社联和武卫会都已是秘密组织了，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还必须有公开团体（现代座谈会已于1935年3月被解散）。一到暑假，机会来了。南翔对我们说：暑假学生回家，我们要动员同学留校，组织暑期同学会。暑期同学会不受正规的清华学生会羁绊，可以独立活动。南翔被选为暑期同学会主席。随之而来的反对日本走私、赈济黄河水灾等活动，都是暑期同学会领导的。暑期同学会派姚依林为清华代表参加北平市的黄河水灾赈济会；众所周知，这个会就是北平学联的前身，它孕育着后来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

在南翔同志领导下，清华暑期同学会不是干巴巴地搞政治运动，而是十分注意同学们的生活问题，以及文体活动。南翔同志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青年运动领导者，也许在清华这一段就是他的初步实践。如组织清寒食堂，解决一些经济困难同学的伙食问题即属一例。还有一事，在清华的一些回忆文章中未见记述，南翔叫周嘉祺（朱辉）和我“设法进入”清华的民众夜校。这个夜校是由学生会领导的，学生大部分是清华工友的女儿，也有附近农民的孩子，而校长和教务长是由两位右派同学担任。周嘉祺和我终于成为该校教员，我还在校中办了一个新文字班，孩子们很快就掌握了拼音文字，能作文和写信。“一二·九”前几天，一到午夜该校的办公室就繁忙起来，因为这里有两台油印机，许多宣传品都是在这里刻印的。

不久，何凤元等获释，张宗植离校。1935年8月，清华恢复党支部。我是由南翔介绍入党的，即在恢复支部的会上宣誓。何凤元原是支部书记，恢复组织后仍任支书，但十月就调到北平市委去了，南翔继任支书，富日健和我任支委。这届组织，迎来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



蒋南翔起草的《告全国民众书》

北平学联在11月18日成立，姚依林任秘书长，当时就酝酿着游行请愿行动。但在清华，要发动这样一场行动却不容易。首先，清华是有“民主”传统的，这样的全校行动必须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正式通过。11月27日召开了一次大会，记得是由南翔任主席，我任提案人。会上发生争执，一片混乱，无结果而散。这才懂得，和过去搞“飞行集会”不同，在知识分子中，必须作充分的“理论”工作。于是，每夜分头专访，小座谈，请名教授演讲时事。紧张地闹了一个星期，12月3日再召开全体大会，经过激烈的辩论，最后表决通过了请愿案。其次，清华是有合法的学生会的，它却无意领导这一运动。因而是由大会另外产生一个清华救国委员会，大约是由十一人组成。救国会的成员名单颇费周折。因为在事前的辩

论中，同学间的左中右倾向已完全分明，救国会的委员要包括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在内，而非左派单干，同时又要掌握领导权。主席一职，原拟由搞过“九·一八”运动的共青团员黄诚担任，反复考虑，决定由当时完全是用功读书的“好学生”周嘉祺担当，黄诚副之。周与黄诚和我是高中同学，曾住同屋，彼此深知。另一副主席则是当时即倾向分明、后来做了蒋经国秘书的陈元。而这一切，都是南翔运筹帷幄，领导布置的。当时，我还不知道“统一战线”之说；南翔是否研究过我不知道；不过，从他对救国会的战略部署看，已是在执行毛主席这一伟大思想了。

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”这是南翔为清华救国会起草的《告全国民众书》中的一句名言，发表后立即传诵全国。这篇《告全国民众书》，短短一千余字，却绝非口号堆积，而是以读书和救国的关系为主题，娓娓而谈，道出当时学生界抑郁多年的心声。文中说我们有愧于“五四”运动的前辈，中间还引用了胡适先生自己的话，说他过去委曲求全地为“不抵抗”辩护，今天却慨然声明“再不能为华北的自治政府辩护了”。文章进而又说，我们“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”，因为抗战不止是守土有责的长官们的事，“民众的地位是更为重要，民众的力量是更为伟大”。今天重读这篇《告全国民众书》，可想见当时22岁的南翔同志，思想见解是多么深刻。

1936年初北平学生举行南下扩大宣传以后，在清华园来了“二·二九”大搜捕。事前我们已有所闻，都不住在自己的宿舍，而是与二院平房中的新同学换位。我住在林兴育房中，南翔住在隔壁。我天未亮即起来理课（那天是期终考试），见到军警憧影，急敲隔壁的墙，叫他做准备。南翔竟跳窗而出，真是失策。因为清华园已被包围，他随即被捕。其实，这时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早已应日本人要求撤离北平，这些捕人的军警都是新

手，这天他们虽有名单，却无照片。他们进屋时，我用广东话说我是林兴育，他们翻看桌子里果有林兴育的笔记本和信件，就走了。姚依林是清晨来校参加考试在校门口被捕的，警特们始终没弄清他是谁，他身上带有一本英文《共产国际通讯》，内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上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，警特们也未发觉。他和南翔还有被捕的方左英都被关在大门口的校警室里，清华校警则是站在学生一边的。天亮，同学们集中在大食堂，当时我是清华民先大队长，即组织民先队员冲进校警室，把他们三人抢出，隐没入人群。当晚，大批二十九军队伍再来清华园搜捕，南翔由三院食堂的工友掩护，在厨房烤火聊天。这晚被捕二十一人，却没有一个支部、救国会或民先的负责人。假若是原来受过特务训练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来捕人，恐怕情况就不同了。

大搜捕后，南翔去上海。8月间，他再回到清华；这时，我已被清华开除，到北大去了。我的回忆也到此为止。不过，我还想赘述五十年后的一事。这时南翔已年逾古稀，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了。1985年12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“一二·九”五十周年纪念会，南翔除作报告外，领导一组同清华等校的现代大学生代表座谈，我也在座。他颇有感慨地提出了一个“代沟”的疑问。如今的“一二·九”尚存者与现代大学青年之间有没有“代沟”？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。蒋南翔同志说，他毕生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和青年运动，直到十年动乱后再长教育部，为改革、开放和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鞠躬尽瘁；“代沟”云云，似难耳顺。然而，天下滔滔，有易与不易，谁又能说“代沟”不是个值得研究的对象呢？

（作者吴承明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，为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，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等。本文出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《蒋南翔纪念文集》）